

## 第二章 理論基礎與文獻探討

---

本論文在進行「俄漢語顏色詞之對比研究」時，牽涉到許多不同的學科，如想要知道顏色詞在不同文化中扮演的角色、運用，及研究在不同文化中顏色詞意涵的比較，必須要進入跨文化交際學、國情語言學、文化語言學中；要探討顏色詞的異同時涉及到對比語言學；而在對蒐集到的語料進行對比分析時則牽涉到詞匯學以及語義學。因此，本章將針對相關科學的理論加以介紹與探討。其中重要的學者與著作包括：跨文化交際學－波特（Porter R. E.），薩莫瓦爾（L.A. Samovar）；國情語言學－維列夏金（Е. М. Верещагин），卡斯托馬羅夫（В. Г. Костомаров）；文化語言學－瑪斯羅娃（В. А. Маслова）；對比語言學－拉多（R. Lado）；詞彙學－法蜜娜（Фомина М. И.），布拉吉娜（Брагина А. А.）；俄語語義學－倪波，顧柏林等。

---

### 第一節 跨文化交際學、國情語言學和文化語言學

德國著名學者恩斯特·卡希爾（Ernst Cassirer）說過：當領悟了一門外語的「神韻」時，我們總會有這樣的感覺，似乎進入了一個新的世界，一個有著它自己理智結構的世界。這就像在異國進行一次有重大發現的遠航……。<sup>1</sup>外語學習者或工作者一定會有相同的感受：在母語與所學外語中有極為相似的地方，同時也存在著極大的差異，當精確的掌握了所學外語，一定會有一番新的體驗與感受。不過學習語言的同時，若忽略對於該國文化的了解，在與人溝通上會產生障礙。語言與文化是不可分割的，但一直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後，才逐漸出現學習語言的同時也須將文化納入考量。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先後出現了跨文化交際學、語言國情學、文化語言學等新興的整合性學科，研究的內容各有側重<sup>2</sup>，但皆是從語言、文

---

<sup>1</sup> 卡希爾，《人論》，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

<sup>2</sup> 吳國華，〈文化語義學導言〉。《語言文化研究新視角（論文集）》（吳國華主編）。軍

化與交際三者之間的關係出發。因此本節將對跨文化交際學、國情語言學和文化語言學進行討論。

在二十世紀後半，人類正式進入地球村時代，在時間與空間緊縮的同時，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機會也漸趨頻繁。在跨文化交際中，如果只掌握了外語的語音、語法與詞匯，已不足以應付跨文化交際時的需求。因為不同的民族中存在著文化差異性，並且這些差異性也會反映在語言中<sup>3</sup>。此時，語言已經不只是個交際的工具。透過語言，我們可以了解一個民族的獨特性，在該語言不僅概括了該民族的歷史經驗和文化傳統，更蘊藏著該民族獨特的思維模式和生活方式，沒有語言就不會有文化的產生，反之亦然。社會學家更進一步指出：所有文化都是獨特的、互不相同的。由於文化的獨特性而產生了語言在使用上的差異，導致互相了解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同文化間的交流常常會遇到困難。因此在學習外語時，必須要考量文化的差異性，才能更有效率的了解該語言。

外語教學專家區分出交際中存在著語言錯誤和文化錯誤，並認為後者所犯的錯誤較為嚴重。沃爾夫森（N. Wolfson）說：「在與外族人交談時，本族人對於他們在語音和語法方面的錯誤往往比較寬容。與此相比，違反說話規則（往往是由於不同的文化差異所引起）則被認為是不夠禮貌的，因為本族人不大可能認識到社會語言學的相對性」。<sup>4</sup>因此現在學習外語時，除了掌握語言之外，更應該加強對於該語言文化的學習，不然會引起很大的文化齟齬。

而跨文化交際學（*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研究的正是擁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在各類交際活動中所產生的問題。一般認為霍爾（E. T. Hall）於 1959 年出版的《無聲的語言》為此學科的開端。霍爾指出：「文化是人類生活的環境。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無不受著文化的影響，並隨著文化的變化而變化，或者說，文化決定人的存在，包括自我表達的方式以及情感流露的方式、思維方式、行為方式、解決問題的方式等等。……

---

事誼文出版社，1999，頁 46~47。

<sup>3</sup> R. E. Potter, L. A. Samovar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1997, p. 5.

<sup>4</sup> N. Wolfson, *Rules of Speaking, in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Longman, 1983, p. 62.

正是這些在一般情況下十分明顯，習以為常，然而很少加以研究的文化方面，以最深刻和最微妙的的方式影響著人們的行為。」<sup>5</sup>例如：為什麼在漢語中白色會讓人與喪禮產生聯想？而又為什麼黃色從原本尊貴、帝王的象徵，演變成在現代漢語中帶有色情的貶義？這些顏色的象徵意義在漢民族的生活中早就習以為常，但這些帶有特殊象徵意義，且民族色彩濃厚的詞匯，在跨文化交際中，就會產生理解上的困難。波特（R. E. Potter）和薩莫瓦爾（L. A. Samovar）就歸納出三個影響跨文化交際的因素：（1）觀察事物的過程：其中包括信念、價值觀念、態度、世界觀和社會體制；（2）語言過程：其中包括語言和思維模式；（3）非語言過程：其中包括非語言行為、時間觀念和空間的使用。<sup>6</sup>由上述三點所造成，在不同民族間的文化與語言之間的差異，正是本論文研究的重點。

語言和文化相互關係的研究幾乎成了永恆的課題，尤其是被一些學者稱為世界文化交融的現代，語言與文化關係的研究更顯得重要。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後期開始，前蘇聯語言學家們積極的研究語言與文化的關係，於是在七十年代初期，前蘇聯誕生了語言國情學（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其研究重點主要放在兩個方面：（1）向學生傳授所學語言國家的國情知識；（2）用所學外語來認識國情知識，加強對該語言的理解，進而發展和提高語言的交際能力。在維列夏金（Е. М. Верещагин）和卡斯托馬羅夫（В. Г. Костомаров）的著作《Язык и культура》（《語言與文化》）一書中，主要是研究文化間的差異，其中，主要理論的基礎是基於語言的三種功能：

（1）交際功能（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ая функция）：

語言是交際者用來傳遞訊息的工具，是人類交際最重要的手段。但只有在說話者和聽話者雙方具有相似的背景知識時，正確無誤的交際才有可能產生，因此在學習語言的過程當中，無論是在口語或者是書面語的使用上，都必須恰當地使用合宜的國情知識，才有可能達到交際的作用。此外，語言的交際功能還體現在人的感知過程當中，除了可以把自己獲得的思想傳遞給它人，在交際的同時，也從對方那裡得到新的思想和訊息。所以交際功能可以說是語言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功能。

---

<sup>5</sup> E. T. Hall, *The Silent Language, Green wish Conn.*, 1959.

<sup>6</sup> 威雨村，〈語言對比和文化對比〉。《對比語言學論文集》（王福祥編）。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2.5，頁 341~343

## (2) 載蓄功能 (кумулятивная функция):

如上面所說的，語言不僅具有交際功能，能用來傳遞訊息，它還具有反映、紀錄和儲存人類發展過程的功能。一方面，語言是一種社會現象，語言在文化發展的各個階段中反映文化，並將其固定下來，世代相傳，成為民族文化和知識的載體；另一方面，語言是個人的財富，由於每個個體有其獨立思考的方式，因此，對於外在世界有著不同的感受，語言完整地保存了這些豐富的生活經驗，形成一套獨特的語言系統。簡言之，語言是真正的「教師」，它傳授給人們的是本身所積聚的全部知識、民族文化和文明。因此，語言的載蓄功能被認為是語言國情學的立論之本。

## (3) 指導功能 (директивная функция):

在交際的過程當中，人可以透過語言來影響對方；相對的，人也可以從語言中獲得新的資訊並且受到教育。語言中包含豐富的民族文化語義可以刺激和發展人的思想，糾正甚至改變人的行為。從哲學角度來看，語言具有邏輯推理功能，符合人的認識思維過程，進而成為每個人思維活動的物質基礎。<sup>7</sup>

上述語言的三項功能對於語言的研究都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且都與本論文息息相關。不過，本篇論文將著重於語言的「載蓄功能」來進行討論，因為「載蓄功能」在語言中詳盡地保存了民族文化的歷史，且從語言單位可以獲得國情知識的來源。國情可以反射在語音單位、詞匯單位和語法單位上，不過由於詞匯單位是文化與國情的主要載體，因此前蘇聯的國情語言學著重研究語義的文化內涵或文化伴隨意義 (культурная коннотация)。<sup>8</sup>維列夏金 (Е. М. Верещагин) 和卡斯托馬羅夫 (В. Г. Костомаров) 給伴隨意義下了這樣的註解：在語言單位中能自然產生聯想的現象。在每種語言中都存在著帶有伴隨意義，且專屬於該民族的文化詞語，如“грач” (白嘴鳥) 在俄語中是春天的象徵，而「黃河」在漢語中則為中華民族的搖籃。當然，還有更多具有不同文化內涵的詞語存在於不同民族的語言中。這些帶有特殊文化色彩的內涵意義，將是我們第三章討論的重點。

<sup>7</sup> Верещагин Е. М. 《Язык и культура: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в преподавании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как иностранного》. М., 1990. стр. 10

<sup>8</sup> 見註 7, стр. 9-16.

洪堡德（В. Гумбольдт）說：擁有一種語言就是擁有一種世界觀。在這裡，語言所代表的已經不只是交際和認知的工具，更被認為是文化的符號。我們知道，透過語言來學習文化已經不是一個新的概念，二十世紀末的語言學者認為：語言不只和文化有關係，更是從文化中發展出來並用以表達文化，語言同時除了是創造、發展的工具，更是文化的保存者及文化的一部分。因此藉著語言的幫助可以創造出客觀、現實存在的物質及心靈文化，文化語言學便是以此為基礎發展而來，主要是研究語言功能中文化與語言間的相互關係和作用。

文化語言學，又稱語言文化學（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是一門綜合性科學，是研究語言學及文化學的聚合體，既可以從文化到語言，也可以從語言到文化進行雙向研究，相互驗證，互補彼此研究之不足。<sup>9</sup>在瑪斯羅娃（М. А. Маслова）語言文化學一書中提到：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因為（1）語言經過世代的傳承，是文化組成的成分之一；（2）語言是掌握文化的基本工具及方法；（3）語言是最重要的文化現象之一，因為如果我們想要了解文化的本質，例如科學、宗教、文學等，應該將其視為形成語言的符號，因為在這些範疇中語言很自然的將文化呈現在人們眼中。<sup>10</sup>顏色也不例外在文化中反映出專屬於各民族的象徵意義：如“зелёный”（綠色的）在俄國帶有年輕、沒有經驗的象徵意義，進入現代漢語中「綠」則帶有濃厚的政治意味。因此，我們可以得知，語言文化學將語言置於一個更大的社會人文背景中去觀察，從考古、人文地理、社會歷史、語言形式等多方面去研究，完整的勾勒出一個多彩而豐滿的語言世界。<sup>11</sup>本論文將針對俄漢語顏色詞組，進行從語言到文化，以及從文化到語言的雙向對比，深入探討俄漢語言在使用上以及文化上的異同。

經過上面的探討，我們可以發現，不論是跨文化交際學、國情語言學或文化語言學，都指出在學習外語的同時也需要加強對於文化的了解，否則常常會因為忽略了雙方繼承不同的文化背景、人文精神以及世界觀，只

---

<sup>9</sup> 紹敬敏主編，《文化語言學中國潮》。北京：語文出版社，1995，頁 81~83。

<sup>10</sup> В. А. Маслова《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 М., 2001. стр. 62.

<sup>11</sup> 周慶華，《語言文化學》，台北：生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4，頁 156。

用自己的文化標準去評斷對方的行爲，而產生不必要的誤解與衝突，進而無法達到交際的真正目的。

## 第二節 詞匯學與語義學

羅曼諾索夫（М. В. Ломоносов, 1711-1765）在《俄羅斯標準語法》（《Россий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1755）書中提到：「人類的社會如果沒有語言的存在，就好像沒有組裝好的機器，零件散落一地，是沒有辦法運轉的。」如果「人類社會成員沒辦法將自己的想法傳達給別人，」那麼人類的生活將不具有任何意義，不可能「比散佈在森林及荒原中的野獸來的好。」<sup>12</sup>在這裡我們可以深刻的感受到語言對於人類發展的重要性，尤其是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詞匯。一般來說，語言中詞的語音形式和表示的概念普遍為全民所理解，但語音和概念之間的關係並非一直是固定不變的。<sup>13</sup>例如：俄語“красный”（紅色的）一開始是用來形容「美麗的」（如 красная девица，美麗的少女），後來因受到法國革命與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красный”（紅色的）帶有「革命」的象徵意義（如 Красная Армия，紅軍）等，此種關係為本論文討論的方向之一。

另外，在某些詞的音義之間具有聯繫，如“колхоз”（集體農莊：коллективное+хозяйство），“зарплата”（工資 заработная+плата），這種詞的音義之間可論證的聯繫方式，稱為詞的內部形式（внутренняя форма слова）。詞的內部形式不等於詞義，但是它對詞義卻有一定的制約作用，不過當詞的內部形式發生變化時，就有可能失去對於詞義的制約作用。例如：俄語“бельё”（內衣）已經失去了和 белый（白色的）的直接聯繫，因為在現代俄語中可以說“белое бельё”（白色的內衣），“голубое бельё”（淺藍色的內衣）。在漢語中我們也可以發現類似的情況：比如「黑板」不一定是黑色的，還出現了白色的甚至是綠色的板子，和黑板的功能是一樣的。<sup>14</sup>由於上述這一類的詞匯已經失去和顏色詞間的直接聯繫，且本論文旨在探討顏色詞在俄漢文化中的象徵意涵，因此，這類詞匯將不列

<sup>12</sup> М. В. Ломоносов,〈О человеческом слове вообще〉,《Россий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СПб. 1755 с. 394.

<sup>13</sup> 王超塵等編，《現代俄語通論》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6，頁 433-434。

<sup>14</sup> 見註 13，頁 435。

入本論文探討之範圍。

詞匯意義的特徵之一是概括性，詞義的概括性決定了特定的語音、和特定概念相聯繫。可是詞義和概念並不相等，概念屬於邏輯範疇，而詞義屬於語言範疇。如在俄語中“вороной”（黑色的）和“чёрный”（黑色的）都表示「黑色的」這個概念，照理說應該可以和所有表示具有「黑色」特徵的詞來做搭配。但事實上並非如此，“вороной”（黑色的）只能和特定的詞搭配使用，如“вороная лошадь”（黑馬）、“вороной скакун”（黑色的跑馬）等。隨著時代的改變，詞匯也不斷地在發展變化，詞匯的變化除了新詞的產生和舊詞的衰亡之外，還包括詞義的演變，也就是新義的產生和舊義的消失。根據產生的先後可以將詞義分成非派生意義和派生意義：如在俄語中“золотой”（金色的）除了「黃金的」為最初的非派生意義之外，其餘如最好的、幸福的、親愛的等都是派生意義。<sup>15</sup>本論文將以派生意義為探討重點，詞匯的非派生意義也在本論文的探討範圍之內。不過，由於非派生意義在不同語言中的差別不大，而派生意義可以明顯的反映出獨特的民族色彩，因此，對於派生意義的探討，可以幫助語言學習者較容易的理解，在面對不同文化時所產生的語言差異，所以派生意義將為本文所探討的重點。

柏拉吉娜(Брагина А. А.)在《詞匯與文化》(《Лексика языка и культура страны》<sup>16</sup>)一書中就有一章專門在討論詞與顏色之間的關係。其中有談論到顏色詞除了原有的物理意義之外，因某些原因而產生的派生意義，如俄語“красный”（紅色的）在與某些詞匯的組合中，除了光譜上所代表的顏色意義，在俄語中還帶有「革命」(Красная Армия, 紅軍)等的文化伴隨意義。此外，理解帶有顏色詞之詞組的正確意義外，若能深入研究顏色詞文化伴隨意義的由來，除了可以加快理解的速度之外，更有助於記憶的保存。此時，除了討論帶有顏色詞之詞組在俄語中的文化伴隨意涵之外，再將其拿來與漢語做比較，將可以得到俄漢語文化及語言有哪些共通性和差異性，除了掌握語言的學習，更可以加強對於兩國文化的了解。

---

<sup>15</sup> 見註 13，頁 440。

<sup>16</sup> Брагина А. А. 《Лексика языка и культура страны: Изучение лексики в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ом аспекте》. М.,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1981. стр. 100~121.

我們知道，語言是由語音和語義結合所產生的符號系統，系統中的語音是語言的表達形式，而與表達形式相對立的則是系統內部的意義部分，也就是語義。在現代語言學家中，最早提出語言形式與內容相互關係的是著名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索緒爾認為，構成語言符號單位，也就是構成詞的要素有二：一是聲音形象，二是概念，兩者結合才能算是完整的符號。爲了消除歧異並且把聲音形象與概念做出區分，他使用「能指」與「所指」這兩個新的專有名詞來表示語言符號的兩項要素。所謂的「能指」是詞語發音後產生在人類記憶中的形象；「所指」則是人們的思維對於外界事物屬性的概括與概念。<sup>17</sup>在結構主義中，使用兩種方式對語義進行研究：一是借助音位學區分音素和語音差異特徵的方式，對詞義的構成也進行切分，試圖找出一些普遍的語義成分，用來進行詞義的區分，這種方法被稱爲語義成分分析法（componential analysis）；另一種就是對於詞匯之間的縱向（聚合）和橫向（組合）關係進行分析。所謂聚合關係（paradigmatic relations），就是語言單位在同一組合體中可以進行替換的關係，如俄語“белый”（白色的），“красный”（紅色的），“чёрный”（黑色的）等顏色詞處於顏色詞的聚合關係中，而聚合體之下又可以再細分出更小的聚合體，如“красный”（紅色的）聚合體之下可以再分出“алый”（鮮紅色的）、“багровый”（深紅色的）、“кумачный”（紅布顏色的）等；而組合關係，就是語言單位與處於同一層級中其它單位的一種結合關係，如“белая ворона”（字面意義爲白烏鴉，意指與眾不同的人）中“белая”（白色的）和“ворона”（烏鴉）之間的關係即爲組合關係。而本文也將借助結構主義中對於詞匯縱向關係和橫向關係，也就是顏色詞之間的聚合關係和顏色詞組的組合關係，來進行俄漢語顏色詞組的分析討論。

對於詞義類型的分類，語言學家們抱持著不同的看法，英國著名語言學家利奇（G. Leech）把常見的語義分成七種類型：

- （1）概念意義（conceptual meaning）：詞的概念意義是詞的中心或核心意義。例如：「孩子」的概念意義是「未成年的人」。

---

<sup>17</sup> 費爾迪南·德·索緒爾著，《普通語言學教程》，弘文館出版社，1985，頁 90-96。



- (2) 聯想意義 ( **associated meaning** ): 詞的附帶意義。例如: 漢語中的「孩子」, 有時會帶有「幼稚」、「不懂事」的聯想涵義; 再如現代漢語中的「藍色」和「綠色」, 除了原本的顏色意義之外, 在現代台灣社會中還會與「政黨」產生聯想。與概念意義相比, 聯想意義較不穩定, 是一種附加意義, 具有開放性和模糊性的特質。
- (3) 社會意義 ( **social meaning** ): 反映出說話人背景及個人特徵的意義, 也就是在方言、俚語、俗語、黑話和行話等等所表達出來的特殊附加意義。例如: 漢語中, 吸毒者會用「紅中」與「白板」來表示毒品。
- (4) 情感意義 ( **emotive meaning** ): 表達說話人情感和態度的附加意義。例如: 漢語中的「妻子」和「黃臉婆」這兩個詞的概念意義相同, 雖然都是用來形容老婆的意思, 不過卻具有不同的情感色彩, 前者是中性的, 但後者明顯地帶有貶義。
- (5) 反映意義 ( **reflected meaning** ): 當一個詞具有多重意義, 其中的某一個意義會讓人聯想到另外一種意義, 而這個意義常常是屬於禁忌的領域。如漢語中的「鷄」除了可以用來指動物之外, 還有妓女的意思; 在漢語中, 黑色除了原本所指的顏色意義之外, 也帶有非法的意涵。
- (6) 搭配意義 ( **collocative meaning** ): 由於某些詞常與固定的詞搭配, 所形成的聯想就稱為搭配意義, 這也是一種附加的意義。例如, 在漢語中「黃色書刊」的固定搭配, 使得黃色讓人聯想到低俗、色情。
- (7) 主題意義 ( **thematic meaning** ): 說話者或是作者通過對信息的組織方式, 如詞序、焦點和強調等所傳達出來的意義。<sup>18</sup>

此外, 蘇聯語言學家拿維可夫 ( Л. А. Новиков ) 則把詞的詞匯意義分成四種類型:

- (1) 理性意義 ( **Сигнификативное значение** ): 在詞典中能找到最一般的解釋意義。
- (2) 結構意義 ( **Структурное значение** ): 包括組合結構意義和聚合結構意義。

---

<sup>18</sup> 趙愛國, 姜雅明著, 《應用語言文化學概論》,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2003, 頁 117-118。

- (3) 語用意義 (Прагмат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說話的人在用詞上所表現的情感意義。
- (4) 語境意義 (Сигмат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在具體的語境中所表現出來的意義。<sup>19</sup>

由於語言中的詞匯數量非常龐大，而且在語義的分類上，每個語言學家有其獨特的觀點及見解，要找到一個適合所有語義的分類著實是一件很困難的任務。因此，本文在語義的分類上，除了借助上述英國語言學家利奇以及蘇聯語言學家拿維可夫的幾項分類之外，本論文語料的分類將借助學者包惠南在《文化語境與語言翻譯》<sup>20</sup>中〈色彩的文化內涵與翻譯〉一文對顏色詞的分類，加以歸納整理，比較俄漢語中顏色詞的對應關係。

根據〈色彩的文化內涵與翻譯〉一文中的分類，顏色詞被分成三大類來討論，分別是：一、基本俄漢顏色詞的語義比較；二、俄漢顏色與民族心理；三、俄漢顏色的社會屬性。在基本顏色詞的語義比較中，主要是探討顏色詞的基本語義在不同語言中使用的異同。在顏色與民族心理的關係中，由於交際的頻繁，因此不同民族有時也會賦予某一種顏色以共同的象徵意義。不過，有時受制於風俗民情、地理環境、思維方式、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異，這類顏色詞組，通常存在著很大的差異性。在顏色詞的社會屬性中，則是討論顏色詞組在歷史、禮儀習俗、政治與經濟中的意義及搭配習慣之異同。當然，受制於不同民族文化的影響之下，這類詞組的差異性也是很大的。

### 第三節 對比語言學

俄國著名教育學家烏申斯基 (К. Д. Ушинский) 說過：「比較是認識和思維的基礎。我們認識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透過比較，而不是採用別的方法。」<sup>21</sup>的確，比較是人類用來認識客觀事物的基本方式之一。透過比較，人們可以清晰的描繪出事物的外部形式，指出某事物區別於其它事物

<sup>19</sup> Новиков Л. А. Семан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М., 1982.

<sup>20</sup> 包惠南，《文化語境與語言翻譯》。中國對外翻譯出版社，2001。

<sup>21</sup> Ушинский К. Д. Избранные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е сочинения. М., 1979, т. 3, ст. 436.

的特殊之處，或事物之間共同處，有助於理解該事物，並且更深刻的了解其內涵。相同的方式也可以應用在語言的學習上。對比語言學的任務是比較兩種（或多種）語言（親屬語或者非親屬語皆可），找出兩種語言形式、結構、功能和用法上的異同。對比語言學的論述，首先出現在俄國喀山學派與波蘭語言學派創始人博杜恩·德·庫爾特內（Baudouin de Courtenay）的著作。他在 1902 年發表的〈斯拉夫諸語言的比較語法〉一文中，明確的指出語言的比較有三種類型：（1）不考慮語言的親屬關係來研究語言過程，以確定兩種語言結構的異同程度；（2）比較兩種或多種因地域鄰近而相互影響出現相似現象的語言，不考慮它們其中的歷史淵源；（3）對不同地區具有共同來源的各種語言進行比較研究。<sup>22</sup>其中第一項便是對比語言學。

在美國，沃爾夫（B. L. Whorf）最早提出「對比語言學」這個名稱，並且預言它比歷史比較語言學更具意義。<sup>23</sup>沃爾夫的對比研究是在結合語言教學，特別是在結合外語教學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對比語言學的任務是在找出所比較語言間的異同之後，釐清存在著哪些異同，尤其是那些差異發生的原因。因為，語言間除了本身結構上的差別外，還存在著許多更深層的因素，如捷克的杜哈切克（O. Duchacek）所提出：有各族人民生活環境、思維方式、生活方式、民情、心理、個性等許多方面的原因。因此，透過對比語言學的研究可以清楚的發現不同語言間的共同處及差異性，這也正是本文希望經由俄漢語顏色詞之對比研究後，可以較清楚的區分出在俄漢語顏色詞的文化意涵以及語言意義。

在對比語言學的研究中，其方法可以是單向，也可以是雙向（甚至是多向的）。所謂單向對比，就是以 A 語言出發，研究 A 語言的範疇、形式、意義在 B 語言中會轉換成何種形式，有何等值物（語言 A 到語言 B）。在這種研究方法下兩種語言的關係為：A 語言為出發語（исходный язык），B 語言為目的語（язык-цель）；而雙向對比則是以某種範疇為基礎，來進行兩種語言的平行對比，沒有出發語與目的語的區分。<sup>24</sup>在本文第四章將

---

<sup>22</sup> Н. А. 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э,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по общему языкознанию, т. д, м., 1963, стр. 30-32.

<sup>23</sup> 轉引自迪·皮特羅（R. J. Di Pietro）：《歐美對比語言學的發展概況》（陳平譯），載《國外語言學》，1980，第 2 期，頁 32。

<sup>24</sup> 張會森，〈對比語言學問題〉，《對比語言學論文集》（王福祥編）。北京：外語教學與

採用雙向對比的方式，來討論俄漢語顏色詞組意義的異同。除了單、雙向的比較，對比研究還有另外兩種方式：分別是「從形式到內容」和「從內容到形式」，其基本原則為以某種共同的範疇為基礎來進行對比。「從形式到內容」的做法為：對比的範疇具有形式性，概括著具有一定內容的形式手段，簡言之，也就是經由語言的外部結構，來探索語言的內在文化，本文第四章即採用此方式，來討論語言在文化中的異同。「從內容到形式」則是：對比的範疇具有語義性質，為語義（概念）範疇，或者是功能語義範疇（如原因、時間、空間、主體、客體、數量等等；或者是親屬、顏色、車輛等語義群），對比的目的是在於對比某固定語義範疇的內部關係和表達手段。<sup>25</sup>在第三章將借由此種方式，來分析在不同文化中，顏色詞的文化象徵意涵。

由於國際間的往來密切，掌握外語有其實質上的需求，在學習外語的同時，文化間的對比也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從語言對比到文化對比充分地展現了對比語言學的發展，語言對比和文化對比並不是相互對立的，相反地，它們相輔相成，可以相互補充和解釋。因為指出事物的異同很容易，但要說明為什麼相同或者是不同的原因，就不是一件簡單的任務了，而這也是對比語言學的最終目的。<sup>26</sup>

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後期開始，經過許多學者的努力，對比語言學不斷的發展，得到以下的成果：第一，早期對比語言學只從事語音和語法結構的對比，現在則擴大到語言的各個層次和連貫性話語，對比的單位也從詞和句子擴大到句群、段落和篇章；第二，早期對比語言學著重於差異，現在則全方面比較語言之間的異同；第三，除了語言單位和語言結構的對比，還進行兩種文化的對比。此後便從語言的對比進行到了兼顧文化的對比。1957年拉多（L. Rado）在《跨文化語言學》一書中指出每一個文化構成的模式由形式（form）、意義（meaning）、和分布（distribution）所組成，它們構成文化對比分析的三個層次，三者並非獨立存在，不過在這裡我們暫且假設它們是相互獨立的來進行討論。文化之間的對比可以透過形

---

研究出版社，1992.5，頁 24。

<sup>25</sup> 見註上，頁 24~25。

<sup>26</sup> 李瑞華編，《英漢對比研究論文集》，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0。

式、意義和分布之間的關係來進行比較：(1) 同一形式，不同意義：當相同的形式在不同的文化中產生不同的分類或意義時。例如：「白骨」和“белая кость”（字面意義為白骨，意指高貴的出身）形式上是相同，但意義卻是大相逕庭：漢語中的白骨指的是死人的骨頭，但在俄語中“белая кость”（字面意義為白骨）卻是代表高貴出身的意思；(2) 同一意義，不同形式：當在兩種文化中相同的意義卻被和兩種不同的形式聯想在一起時也會發生問題。如漢語中的「紅茶」和俄語中的“чёрный чай”（黑茶，意指紅茶）；(3) 同一形式，同一意義，不同分布：相同形式及意義，不同的時間或空間分布，如在中國古代「火」為紅色的代表，在俄國“красный”（紅色的）也會與“красный петух”（字面意義為紅公雞，意指火災）聯想在一起。<sup>27</sup>

在學習第二外語產生困難的地方，通常就是和母語有差異的地方；相對的，兩種語言相似或相同的地方，對學習者而言是較容易掌握的。為了清楚的展示與比較俄漢語顏色詞組之間的異同，本論文將採用雙向交叉對比的方式進行。在第三章討論顏色詞之文化意涵時將採用「從內容到形式」對比，以顏色在文化中的意涵（內容）為基礎，研究其體現在俄、漢語文化中的方式（形式）；第四章從俄漢顏色詞組（形式）在不同主題中的對比找出其在文化中的異同（內容），則是採用「從形式到內容」方式。希望在對比的過程中，除了能對俄漢語顏色詞組做出正確的解釋之外，還能找出俄漢顏色詞中帶有特殊意涵的來源。除了上述兩種比較方式外，本文也將採用拉多所提出的「形式－意義－分布」之對比方式來進行分析研究。

---

經過以上對跨文化交際學、國情語言學、文化語言學、對比語言學、詞匯學與語義學的討論後，在此為本章做一總結：

1. 研究跨文化交際可以從詞匯、語用、交際習俗等語言交際和表情、手勢、動作等非語言交際手段等不同方面進行。由於非語言交際牽涉的層面過

---

<sup>27</sup> R. Lado, *Linguistics across culture. Applied Linguistics for Language Teacher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57, p. 114-120.

於廣大，因此本論文只針對語言交際方面進行討論。

2. 語言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透過語言可以了解一個民族的獨特性，因為語言中概括了民族的歷史經驗和文化傳統，更蘊藏著該民族獨特的思維模式和生活方式，沒有語言就不會有文化的產生，反之亦然。也正因為語言和文化的獨特性，導致了交際上的困難。因此在學習外語時，須考量不同文化間的差異性，才能更有效率的了解該語言。
3. 在俄語國情語言學中所提到語言的三種功能，本論文著重於語言的文化載蓄功能（кумулятивная или культуросная, накопительная функция）。因為語言的載蓄功能，完整的反映、紀錄和保存了人類發展的過程，我們才能在俄語顏色詞中找出獨特的文化內涵及伴隨意義，進而和漢語顏色詞做比較，找出其俄漢顏色詞的相同點和差異性。
4. 本論文探討俄漢顏色詞在文化中的對比研究時，將採用雙向交叉對比方式。在第三章討論俄漢顏色詞在文化中的異同時，將採用「從內容到形式」對比；第四章從俄漢顏色詞（形式）在不同主題中的對比找出其在文化中的異同（內容），則是採用「從形式到內容」方式。而俄漢顏色詞在不同主題的討論則是借助學者包惠南在《文化語境與語言翻譯》<sup>28</sup>中〈色彩的文化內涵與翻譯〉一文對顏色詞的分類，加以歸納整理，比較俄漢語中顏色詞的對應關係。
5. 在進行俄漢語顏色詞之對比研究時，將採用拉多的形式－意義－分布理論來進行分析研究。

---

<sup>28</sup> 見註 20。